

五月是传统的劳作时节。立夏已过,农人锄田,操劳桑麻。气温适宜,坊间场里,百工俱兴。于是编者约来一组稿件,或寻访千余年来的传统手艺,或沉潜于匠人们的身世命运,或梳理书法、家具与金作之美,希望以此来略探多种艺术背后,蕴藏的精神与美学观念。

著书者说

在徽州,寻访工艺千年

洪锋

《指尖上的梦——徽州工匠记》近日由安徽出版集团黄山出版社出版了。这是一本记述徽州工匠的书,简要介绍了徽墨、歙砚、徽派木雕、石雕、砖雕、竹雕和版画7种徽州工艺的历史,讲述了部分非遗传承人的成长故事,并试图通过他们指尖上的工艺,梳理流淌在器物里的、我们民族由古至今传承的工匠精神。

为什么是徽州

在现代化迅速席卷中国乡村的当下,古老的徽州也在革新。

但当一个人踏上徽州故土时,还是能感受到这里的与众不同:白墙黛瓦的徽派老房散落在四乡八里,牌坊、祠堂耸立在村头阡陌,绿树掩映下古桥、古亭出没,古墙上雕刻装饰精美绝伦……它们会让人感受到,古徽州仍在,千年风姿在余韵中流传。

而徽州的一鳞一爪,皆是来自手工艺人的杰作。一代代工匠用自己的双手,雕琢了这一方土地独有的魅力。《指尖上的梦》一书,正是选择徽州作为管窥工匠精神的切入点,因为这里历来巧工辈出,是工匠之乡的沃土。

现在看似已浑然天成的徽州,并非如羚羊挂角,无迹可循。

徽州手工艺的滥觞,离不开独特的自然资源。唐末战乱频仍,河北易水人奚超为躲避战乱逃至徽州,在黄山山脉中发现了大量优质的松树,此为制作上等好墨的最佳原料,于是他决定停下来不走了。彼时,北方松树由于制墨等原因已几近枯竭,此地便逐步诞生了“新安香墨”,即后来的徽墨。再如歙砚,之所以能够声誉鹊起,成为全国四大名砚之一,除了砚工的雕工,得天独厚的婺源龙尾石也居功至伟。同样被冠以“徽州四绝”的砖、木、石、竹雕,无不凭借当地的优质材料。黄山,实为徽州技艺诞生的天然依凭。

徽州工艺的成因,与农耕时代艰苦的生存环境有关。徽州地处万山之中,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,后又因战乱迁人大量移民,人多地少的状况加剧。为了解决生存问题,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外出经商或者从事手工艺百工,“小民多执技艺”成了当时徽州人的一种生存状态,也造就了世代相传的工艺。

徽州工艺可称翘楚,还离不开富庶的徽商和“消费经济”。黄宾虹曾在《新安四巧工》中说,“富商显宦,邻里相望,以故百艺工巧”。大批徽州显贵和富商回乡,有财力在家乡修祠堂、建宅邸。为了显示其地位,他们对房屋的建造尤其是“长脸面”的雕刻,修饰尤为重视,不惜“堆金砌玉”。因而徽派雕琢工艺便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并长盛不衰。

艺心无我无古今

刘耀辉

灯下翻开山西博物院编的《等观:徐天进书作、梓庆山房木作、山石金作》一书,映入眼帘的是中国书法、古典家具、先秦金器三种文化元素,它们或简素淡雅,或沉朴厚重,共同建构了一个古意盎然的“艺术空间”。

诚如该书序作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所言,中国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是“为心而造”的,旨在追求一种内在的美感。书中所收山石金作,系指山西博物院所藏先秦青铜器,其作为中国工艺的典型代表,自是“为心而造”。所收梓庆山房木作,是古典家具学者周默先生和“新古典”家具设计师沈平先生合作推出的一批明式家具,其朴素的材质和简洁的几何形式深得古人神韵,艺术表达亦诚然指向内在美感。至于徐天进先生的书作,虽然是与前二者不同的平面线条艺术,却同样以极简之美,表现出对中国艺术之道的参悟。

徐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,主持过周庙等多个遗址

徽州工艺流传于世,源于每一件工艺作品都带着匠人们的温度,他们用指尖触摸心中的梦。触摸是一种方式,更是一种准则,一种艺德。久而久之,他们的手便与心相印,成了一种自我意识和行为规范,也即工匠之精神。细而化之,笔者认为,工匠精神首先是一种不断自我提升的品格。

徽州历来有“十户之村,不废诵读”的传统,乡村教育之兴盛,享誉全国。很多徽州工匠“学技必先学文”,读书明理加之与名士交往,为他们的工艺蕴染了厚重的文化底蕴。郑振铎在《明代徽州版画》一文中曾写道,“他们知道自己之所作是艺术品,是可珍贵的,和诗文书画以及图画是一样可珍贵的。故他们决不出之以轻心,他们是极慎重的在雕刻着,他们决不苟简潦草。”

国家级非遗徽派砖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方新中,出生于教育世家,其祖父方与严是陶行知教育理念的践行者,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供职于教育部初等教育司和民族教育司。其伯父、父亲均从事教育工作。方新中从小受环境熏陶,获得了较好的家庭教育,遗憾因特殊历史原因未能接受高等教育。他在祖父鼓励下走上雕刻之路后,还定期学习祖父寄来的

徽州历代名工都注重手工艺的传承,李廷珪的制墨工艺从南唐到北宋整整经历了五代人仍享有盛誉。如今徽州工艺的传承,不再局限于家族传承,而是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维度。

尽管所在的工厂来了个“95后”,但歙砚非遗项目国家级传承人曹阶段还是坦言,年轻人太少,有的学了一段时间,认为太苦、太累,就抛掉了,这样进进出出的年轻人已经有十几个了。年轻人少,砚雕技艺就有失传的危险。

对于徽墨而言,年轻人同样是稀缺资源。周美洪说,做这门手艺35岁才成熟,55岁因为体力、眼力等原因就该退场了,黄金时间就20年,很多年轻人对这种枯燥、单调的生活望而生畏,不愿来。周美洪认为,对于徽墨这种劳动密集型工艺而言,工匠是一批一批的,少一个都不行。

诚如斯言,工匠精神如何接续,工匠精神如何传递,关键在于人。令笔者略感欣慰的是,不少徽州现存工艺,已经向年轻人打开传习之门。

徽州版画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潘荣明,是黄山市歙县深度中心学校的老师,在他办公室的角落里,常年放着大量装裱好的学生版画作品,作品会适时在校园展出。学校少年宫其中一间教室门上,挂着“非遗传习基地”的牌子,版画传承教育已成为该校的一个特色,版画班每周一和周三教授两节课。在这里,非遗传承从娃娃抓起不再是一句口号。

徽州竹雕非遗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,收了20多个徒弟。如今,由他筹办的徽州竹雕博物馆和徽州竹雕传习所已经建成开放。其中竹雕工作室建筑面积达6000平方米,收藏展出万余件风格各异的徽州传统雕刻精品及其他流派的精品,参观者可以藉此领略雕刻工艺、雕刻技法的发展史。传习所设有雕刻工坊、家具工坊、高校体验实习坊。洪建华想与高校联手,将非遗课堂搬进雕刻工坊,在实践中传承。他希望用这种方式,培养更

只用眼睛看世界,由此才能参透清静无为的智慧。继老子之后,庄子提出了“以道观之,物无贵贱”,后来王重阳,则进而将“等观一切”奉为全真道的金科玉律了。与此相映成趣的是,佛教经典中亦常会提及“等观”,如《涅槃经》云:“等观众生,如视一子。”《佛说无量寿经》云:“等观三界,空无所有。”北京大觉寺无量寿佛像所展乾隆御题匾额云:“动静等观。”在道家与佛教的交互影响下,历代诗人也写下了不少倡扬“等观”的诗句。如六朝山水诗派创始人谢灵运写有“若乘四等观,永拔三界苦”,北宋湖湘学派代表人物胡寅写有“茅檐与藻树,等观是蓬庐”,南宋诗人苏洵于咏梅之时写下了“等观非自非红,开落那知色自空”,南宋诗人廖行之则在写给其弟弟的诗中谆谆叮嘱:“等观性空两居士,世谛宁忘儿与孙。”这些诗句所反映出的无一不是诗人物我两忘、达观淡泊的生活态度。

或许正是这种生活态度成就了中国艺术内蕴的和谐精神。上古先民留下的青铜器也好,书法家周默和沈平的家具体设计也好,其最为根本的特质不正在于处处体现着和谐之美吗?这种美说白了很简单,就是让人怎么看怎么舒服。但要达到这样的效果,则非得将文心、匠意与艺魂熔于一炉不可。

当然,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,此种神似无他,唯应出于别无二致的艺心。此一艺心,当即“等观”,亦当即“无我”“无古今”。

(作者系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教授、学术委员会主任)

手与心相印

文化专业书籍。基于这样的背景,方新中培养了自身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提升的品格。《指尖上的梦》里,方新中这样讲述他对工匠精神的理解:“传承。一定要做些好的东西才能对得住这个社会,更重要的是艺人的艺德。”他说,如果艺人无艺德,不仅误人子弟也会误了国人。他批判有些人为了挣钱去拼砖块以制造多层雕刻的效果,他认为那是在造假。他甚至有一个“执念”:现在的雕刻,会成为将来的文物。

工匠精神,还是一种追求卓越的品质意识。

工艺随人类活动而产生,本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必需品。然而徽州工艺,百年前就已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文化产业,相当一部分用以满足市场需求。如徽墨,全国拥有优质古松的并非徽州一地,在文人墨客对墨有大量需求的情况下,工匠们仍坚信,只有质量过硬,制成一流墨品,才能在市场上拥有长久的口碑和竞争力。古徽墨的制作技艺可谓登峰造极,李廷珪一门所制“新安香墨”誉满天下,制墨家程君房更是自信地说:“我墨百年,可化黄金”。

开一扇窗等后来人

徽州竹雕非遗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,收了20多个徒弟。如今,由他筹办的徽州竹雕博物馆和徽州竹雕传习所已经建成开放。其中竹雕工作室建筑面积达6000平方米,收藏展出万余件风格各异的徽州传统雕刻精品及其他流派的精品,参观者可以藉此领略雕刻工艺、雕刻技法的发展史。传习所设有雕刻工坊、家具工坊、高校体验实习坊。洪建华想与高校联手,将非遗课堂搬进雕刻工坊,在实践中传承。他希望用这种方式,培养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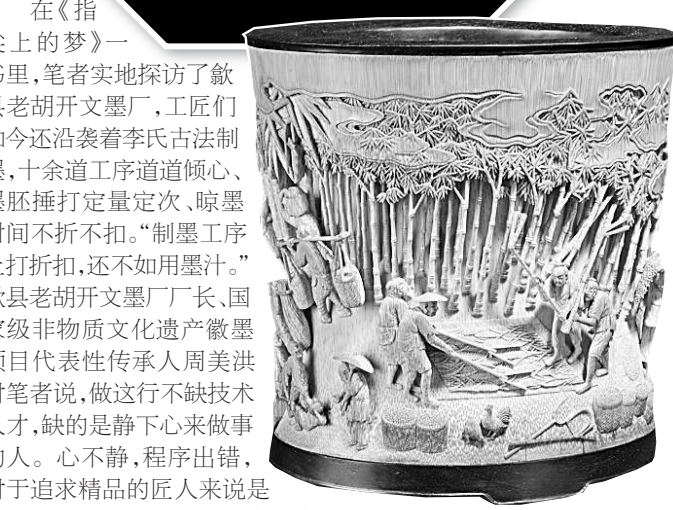
多高标准工艺传承、复兴人才。时至今日,很多徽州工艺品类因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改变已经消亡。即使生存下来的很多老手艺,也或多或少面临着现实的困境,创新已成难题中应有之义。徽州竹雕秉持手工雕刻,但眼下很多地方石雕已产业化、流水线生产,徽州石雕是坐困愁城还是另谋出路?如何不被市场淘汰,更好通过获取效益反哺这门老手艺?徽州竹雕非遗项目传承人程长进在思考也在改变,他在保留核心手工制作工艺的基础上,将制图、打胚等外围工作交给科技手段,以节省人力成本,“要保护传统,必须创新”。

在书写《指尖上的梦》这本书时,除了记述与梳理工匠精神之外,笔者还希望,能打开一扇窗,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手工艺的历史与传承现状。如果这本书有幸被更多年轻人读到,则是笔者为传统手工艺的传承,略尽了些绵力。

(作者系《指尖上的梦——徽州工匠记》一书作者,大院新闻执行总编辑)



安徽歙县“项氏徽墨”的工人为徽干的墨进行研磨。新华社发



竹刻笔筒《农家乐》 本文作者提供

立就有上百人。这幅作品如今藏于他自己的“徽艺堂”。知名学者冯其庸曾为此作诗一首:“千秋名作上河图,鬼斧神工刻宝珠。乍见东京繁盛日,王刀张笔共驱驰”,足见评价之高。《指尖上的梦》中,记下了王金生创作这幅作品的意图:做了一辈子木雕,想给雕《清明上河图》,作品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,其中仅一座桥上站

他们身上,有时间的辩证法

陈曦

作家葛亮的短篇小说集《瓦猫》是迷人的。自读者顺着类似套盒的结构进入故事的那一刻起,就会发现内含的三篇小说,无论是《书匠》《飞发》抑或是《瓦猫》,都如同鲸吸百川般,带他们进入一个漩涡,一个似乎只属于匠人,又确凿关照着每一个生命的,颇有哲学意味的漩涡。这种书写是带有文主义精神的写实。我们看到了手工业者的“执”与“自在”,也透过故事的肌理看到了人的力量与意义。

在《瓦猫》三篇中,我们首先读到的是这样几个人:传统书匠老董、取法西方的书匠简、广东飞发师翟玉成、上海理发师庄师傅,以及制作瓦猫的荣瑞红一家几代。这些人都是故事的主人公,同时也是牵引读者漫溯时光、深潜精神与情感险滩的涉渡者。放置在“当下”的语境中,他们是那样不合时宜、格格不入,他们固执地守持着自己的手艺,以及手艺背后那份对传统与精神的眷恋,日复一日,直至生命的终点。

与其说葛亮写的是传奇匠人,不若说他在深描一种精神。“整旧如旧”,他写旧手艺,便是梳理可以助人“免疫于时代跌宕”的“旧精神”,“良工”与“故物”具是“表”,尽管他们如此迷人,但小说的“里”终归是作者的抱负,他渴望书写的是一剂良方,给忙碌的现代人以沉着,以自在。

这些匠人各具脾性,各有故事。小说抽丝剥茧还原他们的人生,写他们的精彩与困顿,辉煌与艰难。他们无一不激进过,但最终都选择了退守,退守于内心,讷于言而工于艺,最终获得了能够超越时空的安定与从容。

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倔强的,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自己技艺的郑重。然而读他们的故事,却让在现代化飞速推进中见证并习惯了速度的人们,感受到一种可以超越时代变迁的永恒力量。

小说中,简的书店,翟玉成的“孔雀”,庄师傅的“温莎”,老董家的“瓦猫坊”,都被坚持到了匠人能够为继的最后时刻,尽管最后也难逃消亡的宿命,然而在匠人沉默的坚守中,彰显出了人力量与伟岸,那是一种敢于与时间抗衡的勇气,也正是这种“逆势而行”的勇气,让他们的生命勃然而有生机。

在《飞发》的结尾,斗了半生的老对手庄师傅特意赶来为行将就木的翟玉成理发净面。步履蹒跚的老者小心地垫高翟师傅的头,然后一点点剪,规矩短每一丝不苟,那空空的病房里,“咔嚓咔嚓”的落发声犹如一声声告别,又如同一首只属于同道的挽歌。然后是净面剃须,利落且从容。翟师傅留给世界最后一句话,是微笑着的“好手勢”。那是凝聚了一生的坚守后,最后的释然。在两位师傅惺惺惜惜、互为砥礪的瞬间,我们看到了比生命更加珍贵的东西,那是时间和衰朽带不去的坦然。他们坚守着手艺,最终获得了不足与外人道的自在,抵达了“狂飙突进都经过,次第春风到吾庐”的境界。

相比于两位理发师,简修书似乎更为孤独。因为她的工作必须独对残卷,那是一种为书籍再次赋予生命的修补,她需要对抗的是“事半功倍”的草率。她拒绝以细节的冰冷和粗糙为代价运用所谓的现代手段,修书于她,不仅是工作,更是生命与情感的价值,她要做的,是“良工”,葆全旧物,护持文化甚至是自身的尊严。所以中风的她拼尽全力只留下了歪歪扭扭的字迹——“修不了书”。工匠们的执着是与生命同频共振的。他们是讲究的,一行一动必有出处,所作所为定有章法。其内蕴是真挚和郑重,他们以工作确认自身的存在,以此面对起落与荣枯。

然而,他们也都是艰难的,但艰难从来不自手工艺,反而是手工艺给了他们与时代、与命运相抗衡的铠甲与武器。小说中的匠人们都经历了时代必然的波折,经历了峰顶与低谷。简的书店与翟师傅的“孔雀”都在经济的大萧条中消失在城市的版图中,“成为了某个阶层温柔的时代断片”,荣家的瓦猫则是经历了战乱与乱离。作为旧时的匠人,他们不得不面对技术进步、时代变迁带来的行业消亡,是手工艺给了他们慰藉,也给了他们挺身而行的精神资本。

在扉页上,葛亮引用了辛波斯卡的诗句——金属,陶器,鸟的羽毛/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/可真正战胜时间的又是谁呢?(作者系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)

读书者说

作家葛亮的短篇小说集《瓦猫》是迷人的。自读者顺着类似套盒的结构进入故事的那一刻起,就会发现内含的三篇小说,无论是《书匠》《飞发》抑或是《瓦猫》,都如同鲸吸百川般,带他们进入一个漩涡,一个似乎只属于匠人,又确凿关照着每一个生命的,颇有哲学意味的漩涡。这种书写是带有文主义精神的写实。我们看到了手工业者的“执”与“自在”,也透过故事的肌理看到了人的力量与意义。

在《瓦猫》三篇中,我们首先读到的是这样几个人:传统书匠老董、取法西方的书匠简、广东飞发师翟玉成、上海理发师庄师傅,以及制作瓦猫的荣瑞红一家几代。这些人都是故事的主人公,同时也是牵引读者漫溯时光、深潜精神与情感险滩的涉渡者。放置在“当下”的语境中,他们是那样不合时宜、格格不入,他们固执地守持着自己的手艺,以及手艺背后那份对传统与精神的眷恋,日复一日,直至生命的终点。

与其说葛亮写的是传奇匠人,不若说他在深描一种精神。“整旧如旧”,他写旧手艺,便是梳理可以助人“免疫于时代跌宕”的“旧精神”,“良工”与“故物”具是“表”,尽管他们如此迷人,但小说的“里”终归是作者的抱负,他渴望书写的是一剂良方,给忙碌的现代人以沉着,以自在。

这些匠人各具脾性,各有故事。小说抽丝剥茧还原他们的人生,写他们的精彩与困顿,辉煌与艰难。他们无一不激进过,但最终都选择了退守,退守于内心,讷于言而工于艺,最终获得了能够超越时空的安定与从容。

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倔强的,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自己技艺的郑重。然而读他们的故事,却让在现代化飞速推进中见证并习惯了速度的人们,感受到一种可以超越时代变迁的永恒力量。

小说中,简的书店,翟玉成的“孔雀”,庄师傅的“温莎”,老董家的“瓦猫坊”,都被坚持到了匠人能够为继的最后时刻,尽管最后也难逃消亡的宿命,然而在匠人沉默的坚守中,彰显出了人力量与伟岸,那是一种敢于与时间抗衡的勇气,也正是这种“逆势而行”的勇气,让他们的生命勃然而有生机。

在《飞发》的结尾,斗了半生的老对手庄师傅特意赶来为行将就木的翟玉成理发净面。步履蹒跚的老者小心地垫高翟师傅的头,然后一点点剪,规矩短每一丝不苟,那空空的病房里,“咔嚓咔嚓”的落发声犹如一声声告别,又如同一首只属于同道的挽歌。然后是净面剃须,利落且从容。翟师傅留给世界最后一句话,是微笑着的“好手勢”。那是凝聚了一生的坚守后,最后的释然。在两位师傅惺惺惜惜、互为砥礪的瞬间,我们看到了比生命更加珍贵的东西,那是时间和衰朽带不去的坦然。他们坚守着手艺,最终获得了不足与外人道的自在,抵达了“狂飙突进都经过,次第春风到吾庐”的境界。

相比于两位理发师,简修书似乎更为孤独。因为她的工作必须独对残卷,那是一种为书籍再次赋予生命的修补,她需要对抗的是“事半功倍”的草率。她拒绝以细节的冰冷和粗糙为代价运用所谓的现代手段,修书于她,不仅是工作,更是生命与情感的价值,她要做的,是“良工”,葆全旧物,护持文化甚至是自身的尊严。所以中风的她拼尽全力只留下了歪歪扭扭的字迹——“修不了书”。工匠们的执着是与生命同频共振的。他们是讲究的,一行一动必有出处,所作所为定有章法。其内蕴是真挚和郑重,他们以工作确认自身的存在,以此面对起落与荣枯。

然而,他们也都是艰难的,但艰难从来不自手工艺,反而是手工艺给了他们与时代、与命运相抗衡的铠甲与武器。小说中的匠人们都经历了时代必然的波折,经历了峰顶与低谷。简的书店与翟师傅的“孔雀”都在经济的大萧条中消失在城市的版图中,“成为了某个阶层温柔的时代断片”,荣家的瓦猫则是经历了战乱与乱离。作为旧时的匠人,他们不得不面对技术进步、时代变迁带来的行业消亡,是手工艺给了他们慰藉,也给了他们挺身而行的精神资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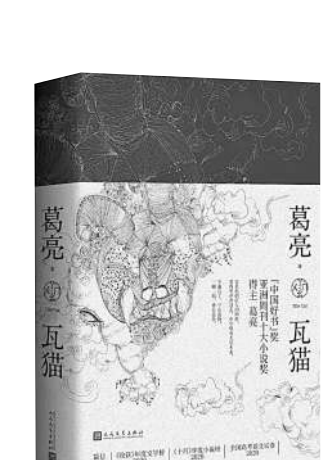
在扉页上,葛亮引用了辛波斯卡的诗句——金属,陶器,鸟的羽毛/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/可真正战胜时间的又是谁呢?(作者系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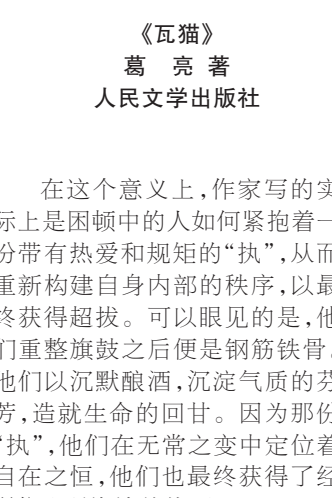
葛亮《瓦猫》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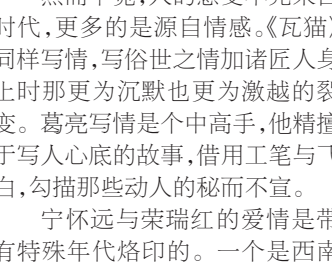
洪锋《指尖上的梦》 安徽出版集团黄山出版社



刘耀辉《艺心无我无古今》 山西博物院



潘荣明《开一扇窗等后来人》 安徽出版集团黄山出版社



方新中《手与心相印》 安徽出版集团黄山出版社